

毛主席在延安 领导中国革命的十三年

(内部文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训练部

一九七八年一月

毛 主 席 语 录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目 录

前 言.....	(1)
一、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	(3)
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7)
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	(12)
四、延安整风运动.....	(26)
五、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	(34)
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39)
七、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42)
八、毛主席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46)
附 1：延安革命旧址介绍.....	(58)
附 2：毛主席在陕北革命活动示意图	
附 3：敬爱的周总理在转战陕北途中.....	(63)

前 言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在陕北革命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相接的各一部分地方，共辖二十三个县，面积近十三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五十万。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毛主席、党中央于同年十二月到达瓦窑堡（今子长县）。一九三六年七月移住保安（今志丹县）。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进驻延安。

一九四七年春，蒋胡匪军进犯延安。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主席、党中央率领我军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九四八年春，西北战场我军转入外线进攻。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和党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一九四九年三月，进驻北京。

毛主席、党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将近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里，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同王明、张国焘、刘少奇等右的和“左”的机会主

义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为我党完整地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系统地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写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一百五十八篇文章中，在陕北写的就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在延安写的有九十二篇。毛主席在陕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打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党的历史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新时期。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过程。

毛主席制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当时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推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我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九月，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党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批判了林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等右倾悲观论调，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地先后发展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到一九三〇年，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反对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时，他们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转为保守主义，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他们又变为逃跑主义，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从瑞金到遵义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中央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

王明的错误路线，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使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而自封为“百分之百”正确的王明原来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的标志。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摆脱了被动局面，展开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突破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把蒋介石几十万军队搞得晕头转向，远远甩在后边。我军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长征中决定性的胜利。

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红军胜利进军，飞夺泸定桥，抢渡

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六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为了迎接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潮，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进军陕北，这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不到陕北，就不能到华北、华东、华中和东北地区，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的张国焘，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北上抗日。毛儿盖会议决定将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越过草地，继续北上。但左路军进至阿坝地区后，张国焘违抗北上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阴谋用枪指挥党，以武力危害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党中央在四川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决定继续向陕北前进。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翻过岷山，突破腊子口，越过六盘山，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

但是，张国焘率领被他欺骗的红军继续南下，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地区退却，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同意北上。但张国焘又用欺骗手段，命令四方面军先锋部队组织西路军从甘肃靖远渡黄河向青海西进，结果两万多人除几百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叛党行为作了系统的批判总结。张国焘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一九三八年四月初，他以祭黄帝陵为名逃出陕

甘宁边区，只身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同年四月十八日，党中央决定把张国焘开除出党。

毛主席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中央红军长征到吴起镇时，敌人四个骑兵团尾追而来。为了不把敌人引进根据地，毛主席当天晚上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切尾巴”的问题。会上，毛主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会后，毛主席亲自指挥我军步兵打敌骑兵，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了三个团，打掉了尾追红军的敌人。

毛主席、党中央到达陕北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内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外有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刘志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一九三五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执行者，排斥、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刘志丹同志。在肃反工作中，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刘志丹同志和一些军队、地方干部。吴起镇战斗后的第二天，毛主席率领红军主力沿洛河川南下，到达甘泉县下寺湾（陕甘根据地首府所在地），党中央当即决定，释放刘志丹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停止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地区的执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反党分子高岗，飞扬跋扈，竭力宣扬“地方主义”，胡说什么“陕北救了中央”。这完全是颠倒历史，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

十一月，毛主席又在富县东村部署了直罗镇战役。当时国民党军队以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陕甘边区进攻：东边一个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犯，妄图在富县地区夹击我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我军在富县西南的直罗镇摆下了“口袋阵”，以小部兵力诱敌一〇九师进入直罗镇，主力从南北两面夹攻全歼敌一〇九师，活捉敌师长牛元峰。追击中又在黑水寺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的“围剿”。

毛主席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霸全中国，在一九三一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们东北，一九三五年又向我华北地区发动侵略。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党高举民族解放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签订抗日协定，实行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我党领导下，

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抗日救亡大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

“一二九”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形势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闭眼不看变化了的形势和阶级关系，鼓吹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他们否认各中间阶级、阶层的抗日要求，说什么“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对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等等。他们坚持关门主义，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毛主席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这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中央会议。

二十七日，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主席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形势的基本特点出发，深刻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说明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主席并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可能引起地主买办阶级营

垒的分化，“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为了更广泛地争取各抗日阶级进入统一战线，毛主席提出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毛主席的报告为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以后，为了实现对日作战，一九三六年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准备取道山西，开赴河北、察哈尔的抗日前线。但当红军进入山西后，蒋介石、阎锡山调集二十万兵力阻挡红军的抗日去路，同时又命令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其它驻陕、甘的军队，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扰乱后方，妄图消灭我军。东征的红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给蒋、阎反动军队以迎头痛击。为了顾全大局，党中央决定红军主动撤回黄河西岸，于五月五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反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政策。五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延川太相寺会议上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进，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近万人），筹备了抗日经费，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我党又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以便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统一战线。

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仍继续向我后方进攻。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六月初，红军又开始西进。

在西进中，红军给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抗日

的后方，形成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十月，西进的红军与北上抗日的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汇合，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武装力量。这时，蒋介石调集胡宗南、张学良五个军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十一月，会师后的红军，遵照毛主席坚决打击蒋胡主力，歼其一部或全部，以达到分化孤立敌人之目的，以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指示，以少部兵力阻击东北军，集中主力在甘肃环县的山城堡，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又两个团，这是结束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打击了蒋胡主力，争取了东北军，动员了陕甘宁广大人民，包括回、蒙等少数民族，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国民党的军队分中央军（蒋介石的嫡系）和杂牌军（非蒋介石嫡系，处于受歧视排挤地位）两种，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属于后一种。被蒋介石派到陕西、甘肃一带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屡遭失败，深感进攻红军没有前途。在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的形势下，他们中的爱国官兵对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日益不满。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一九三六年初，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接受了党的抗日主张。张、杨与红军互派代表，多次谈判，双方实际上处于停战状态。张、杨多次要求蒋介石抗日，但蒋介石拒绝他们的建议，而且又派遣三十万嫡系部队进入陕甘宁地区，准备进攻红军，监视张、杨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蒋介石亲自去西安逼迫张、杨进攻红军、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准备撤销张、杨的职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下级官兵的愤慨。张、杨在此情况下，于十二月十二日扣留了坚持卖

国、反共和内战的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扩大中国内战，以利灭亡中国。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打着“讨逆”的旗号，积极准备进攻潼关，轰炸西安，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以利日寇的进攻。英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积极主张谈判解决。国民党亲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为了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竭力使南京和西安之间取得妥协。

在我党内部，张国焘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的错误主张。毛主席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形势，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英明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同时，红军开赴潼关、商洛一带，准备对付亲日派的军事进攻。周恩来等同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毛主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毛主席和党中央进驻延安。

一九三七年二月，党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我党也作出了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和工农民主政府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党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

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一个重要政治步骤。

一九三七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主持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主席分析了国内和平实现后的政治形势，批判了不争取民主，只强调抗日的错误观点，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争取民主是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没有民主，就不能巩固和平，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实现抗战。毛主席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告诫全党警惕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强调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这次会议批准了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政治路线，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月十五日，党中央把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迟至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才被迫发表了这个宣言，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的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七月八日，以毛主席为

首的党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七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去。十四日，毛主席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广大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集会、游行、示威，拿起武器，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

但是，抗战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的路线，口头上宣布抗战，却反对发动全国人民，仍然同日寇勾勾搭搭，妥协退让，并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削弱革命人民的力量。另一条是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抗战。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说明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号召全国军民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争取自由解放的前途。

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抗日运动，这种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只有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彻底战胜日寇。毛主席号召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通过的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纲领，是发动群众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但是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在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从极“左”跳到极右，又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洛川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围绕着抗日战争领导权，在三个原则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在

中日战争问题上，他们单纯主张依靠国民党二百万军队进行抗战，妄想取得“速胜”。反对毛主席发动群众进行持久战的正确意见；（2）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们主张人民军队立即全部开赴抗日前线，反对毛主席对国民党要保持警惕的正确主张；（3）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他们主张打运动战，反对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正确方针。会议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政治路线，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决定了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针对党内正在滋长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着重地强调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这次会议是一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洛川会议后，我工农红军和坚持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分成许多支队，开赴抗日前线，挺进敌后。我军根据毛主席规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战略原则，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地取得胜利。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节节败退，接着放弃了上海、南京等地，退到武汉、重庆，一溃千里，大片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在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指导下，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战场，两种完全不同的局面。

这一时期，我们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表现为：新军阀主义倾向，不愿严格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耀，发展个人英雄主义；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在